

焦點評析

北非與中東革命之根源與其意涵

Origin and Implications of Jasmine Revolution in North Africa and Middle East

廖顯謨 *Hsien-Mo Liao*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前言

1989年初，沒有任何國際政治學家能預測年底後蘇聯與東歐共產黨政權會接連跨台；伊朗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震驚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1917年的俄國革命讓境內外交人員措手不及，連列寧也嚇了一跳。1910年的黃花崗起義在精心策劃下壯烈失敗，1911年雙十革命卻是突然起事，但它成功了。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民主思潮再次傳至歐洲各地，又引起一次的民主浪潮，各國為適應這浪潮，大都頒布憲法，設立國會，連保守的神聖同盟發啓者-奧相梅特涅也倒台了。時至2011年，同樣也沒有任何所謂的國際政治大師或政治觀察家能預警突尼西亞會發生茉莉革命，其反對群眾的力量由集結到爆發，速度快到突國總統賓阿里想妥協都來不及。在網際網路世代，這次在北非茉莉革命的原因與它的意義，確實不得不讓全球的政治人物深思或反省。

二、茉莉革命之政治經濟因素

受茉莉革命影響的北非甚至中東國家之中，有一個相似的特色，那就是不少領導人在位時間太久。依今年二月份的時代雜誌統計，突國的賓阿里（Ben Ali）在位 23 年；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29 年；葉門的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32 年；巴林的哈馬賓伊沙阿弗利卡（Hamad bin Isa al-khailf）11 年；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Gaddafi）41 年；阿爾及利亞布特弗利卡總統（Abdelaziz Bouteflika）在位 11 年；蘇丹總統巴希爾（Omar Hassan al-Bashir）在位 21 年，摩洛哥的穆罕默德（Mohammed VI）在位 11 年，敘利亞的阿賽德（Bashar Assad）在位 10 年。¹ 只有沙國國王只任 5 年，但君主國家因世襲，一樣沒有政權輪替，故與長期執政並無不同。領導人或單一皇室在位太久，民怨無處宣洩，常是革命引線。而民怨的怒火若有了明確的對象，那衝擊力會很大。

專制獨裁政權下，如果人民生活又如果不好，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缺乏公義，人民相對剝奪感強，民怨就深。長期的獨裁形成腐敗的統治集團在年輕人失業率高、民生物價高漲、房價高、又缺乏自由與人權等問題的交織影響下的火花，也會是點然引信的火苗。2010 年 12 月在突尼西亞一名受過高等教育卻失業的 26 歲青年西迪布宰德（Sidi Bouzid），因無照擺攤賣蔬果卻遭警方沒收，憤而引火自焚抗議的衝擊與「維基解密」網站公布的美國大使館外交電文揭開突國第一家庭貪腐內幕，卻造成賓阿里急速下台，這絕對是取締西迪布宰德的那名員警所始料未及的。

突國的群眾示威很快的影響北非和中東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埃及、葉門、巴林與沙烏地阿拉伯、約旦、敘利亞和蘇丹等國家。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都和突尼西亞相似。但若純以貪腐與民生來歸類的話，約旦、突尼西亞、巴林與沙國是屬於貪污少一點，人民生活水平較好的國家（Less Corruption, Better Standard of Living）；而葉門、敘利亞、蘇

¹ *Time*, Feb 14, 2011, p.23.

丹與利比亞則是屬於貪污較嚴重，人民生活水平最壞的國家（More Corruption, Worse Standard of Living），而摩洛哥、埃及與阿爾及利亞則介於兩個極端之間。以革命成功的第一站突尼西亞而言，2005-09年經濟成長率皆在4%以上；眾所矚目的埃及，2005-10年經濟成長率則在5%到7%之間，並不算差。人民生活水平較差的葉門、敘利亞、蘇丹與利比亞茉莉革命反而不易成功。由此可知，茉莉革命絕非單純的貧困引致反抗的說法所能解釋的。

西亞與北非被壓迫的人民都期待能夠像突尼西亞人民一樣勇敢地改變現況，為自己爭出頭天。他們或多或少模仿突尼西亞人民的做法。問題是動機一樣但結果則不盡相同。突尼西亞與埃及已經開花，但是否能結成民主果實有待觀察，畢竟制度的建立可以是一時的，但穩固民主根基的奠定則需要長期方能建立，而利比亞的這朵「血紅茉莉」是否能開花尚在未定之天。沙國皇室面對民眾示威，要求民主，卻以金錢安定民心。二月底時，阿不都拉就推出370億美元的福利措施，主要是針對年輕人、公務員和失業者，果然有效。在18世紀下半期曾出現在歐洲的「開明專制」(The Enlightened Despots)，隱約在二十一世紀的阿國出現。

三、茉莉革命之社會文化因素

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社會，政治、文化都相當保守，尤其在政教合一國家。在世界史上，曾有基督教與回教的宗教戰爭，然現今回教內部之衝突，更甚於對異教之戰爭。如果說政治與經濟因素是此次茉莉革命之主要起因，而宗教因素與外力則與後續發展有著更重要的關係。阿拉伯內部的民眾抗爭，其實沙國示威規模很小，且集中在東部什葉派聚集富產石油的東部省，西亞與北非大部由遜尼派主政，什葉派常受歧視，但中東最大國伊朗卻是由什葉派主政，伊國又是該地區在野什葉派背後最大支持力量。宗教一直是回教國家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變數。

除了社會與宗教等文化因素外，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因素」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人口爆炸」亦牽動社會結構與影響它的穩定。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激增，除了一般的醫藥衛生進步外，阿拉伯人對大家庭的偏好也是主因。² 以埃及為例，1789年拿破崙入侵時才約300萬。1947年普查時1900萬，1976年普查結果3660萬，之後每年約以2.9%比例增加，在1986年超過5000萬，1996年6000萬，2000年時有6500萬人，2003年約7000萬人，2006年人口普查時7300萬人，到2010年時已超過8000萬人。³ 年輕人多，失業嚴重，這在北非與中東地區是普遍的現象。這種因為人口激增導致的就業壓力，造成「年輕、火氣大與貧窮」年輕龐大族群對經濟與政治的不滿，恐怕才是此次民主風潮的最大動力根源。

但從如今發展跡象觀察，這次的民主革命確是向民主大步邁進了。理由是這次革命的兩大主角是「網路資訊」與「年輕人」。資訊時代民眾的視野更加寬廣，人民不好騙了，人民會比較，心理就容易產生不平衡，因而人民向統治有了不一樣的要求，當人民之需求與統治者之立場無法平衡，又無民主機制可解決的話，革命之火就容易點燃。社會條件常是革命之因，但即使具有革命成熟的社會條件，革命也不一定自動發生，它還需要導火線（Accelerator）。導火線普遍存在於社會上的民怨，而民怨源自於社會、經濟與文化問題。

四、結論：茉莉革命的啓示

就革命的發生而言，歷史上的革命風潮沒有任何人能事先預測。主要以研究人類社會行為的社會科學其實比自然科學更難。社會科學專家常會變成門外漢，但沒有受過正規政治學教育的人，也會有政治的經典語言與看法，難怪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Austin Ranny亦曾言，政治就

² 田寶岱主編，饒綺立譯，《阿拉伯世界》（台北：阿拉伯文化經濟協會，1990年），頁7。

³ “Egypt Population,” <http://www.mapsofworld.com/egypt/egypt-population.html>；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www.sis.gov.eg/>。

在日常言談中。而政治正是你想離開但卻是不可能離得開東西。自然科學就不容易有這一類的問題，所以會如此是因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或變因可以控制。社會行為的根源-人，有感情、有價值，「人」這個變因往往不可控制，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只要有理論基礎，更需要有很豐富的社會經歷，然醫生要救人不一定要涉世很深，更不須要口若懸河。

就人民力量匯集而言，如果說 1960 年甘迺迪贏得大選是靠電視，2008 年歐巴馬則是靠網際網路。近年來，就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而言，網站成為散播理念和訴求的廉價媒體與利器。電子郵件是通訊、宣傳和動員快速管道，部落格 (Blog) 和社群網絡 (Social Network) 如臉書 (Facebook) 與推特 (Twitter) 等，成為溝通者和受者溝通的快速平台。2000 年 1 月菲總統被國會的彈劾審判暫停，抗議者以簡訊串連，在短短幾天內就引起上百萬人集結示威，迫使艾斯特拉達下台，這是現代網路資訊協助人成功推翻統治者的第一個例子，它發生在亞洲。當時連艾斯特拉達都不得不承認與譴責讓他下台的「簡訊世代」(Text-messaging Generation)。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史瑞琦 (Clay Shirky) 就指出，社會媒體 (Social Media) 成了全球公民社會生活一部份，它所涉及到的行為者：一般公民、活躍份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電訊集團、軟體提供者等。他更提醒美國政府要注意無所不在的新興社會媒體，對美國利益的可能影響，與美國要以什麼政策去回應它。⁴菲國人民以網路力量迫使艾斯特拉達下台十年後，另一實例已於 2011 年在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不只如此，在過去的十年中不論是 2004 年在西班牙，2006 年在白俄羅斯，2009 年在摩達維瓦 (Moldova) 與在伊朗的綠色運動 (Green Movement) 等，民眾的串連都與無所不在，沒有「指揮者」的新溝通工具，現代高科技網際網路有關係。這讓現在的政府與政客不得不正視它對國家的利益有何影響，與政客們如何去面對與因應。

⁴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11), pp.28-41.

就歐美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而言，最早期的現實主義學者卡爾（E. H. Carr）早就說過，道德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是整個國際研究對象中最模糊與最困難的，烏托邦常常不自覺的成為有巨大利益者的工具，同時也讓自已受到災難。⁵利比亞的革命由於格達費的頑抗而受到西方聯軍的軍事制裁。2011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1973號制裁決議。這個人道干預為名的決議給予西方合法動武依據。而首先發難的卻是法國，甚至連丹麥與挪威也來插一腳，這都是前所未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引用了所謂「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新思維授權動武。「R2P」或「R to P」主要有三個原則：（1）國家有要的责任去保護它的人民免於受到違背人性的大屠殺、種族滅絕戰爭與其它罪行的荼毒；（2）國際社會承諾提供協助以幫忙須要的國家建立保護其人民免於之暴行，或協助抒解危機即將危機與衝突即將爆發的國家；（3）焦點放在，當一個國家明顯的失去保護其人民的能力時，國際社會有責任及時決定採取行動防止群眾暴行之發生。難道「R2P」是新出台的國際制裁理論？歐美對格達費的制裁究竟是為了人權下的利益或是單純人權，恐怕沒有定論。

就民主國家而言，因為有定期選舉，以數人頭方式代替打破人頭，以選票代替子彈，讓民怨定期宣瀉，就算有導火線也不易點燃。所以民主國家不用懼怕茉莉革命，這也是民主社會與體制的可貴之處。北非的民主茉莉究竟能開多少花結多少果，尚在未定之天。眼看第三波民主革命後，民主成為普世價值，但民主似乎沒有進一步深化或鞏固，反而在俄羅斯與東歐，甚至台灣都有倒退的跡象，實令民主信仰者憂心。

⁵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1981), pp.146-147.